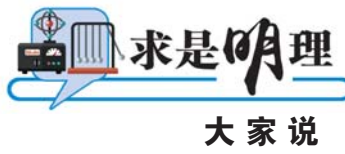


## 执纪严明影响经济发展吗？



求是明理 大家说

12月4日是中央八项规定出台三周年，截至今年10月31日，全国已累计查处违反八项规定问题逾10万起。纪律越来越严明，规矩越来越具体，这是广大党员干部对中央扭转党风社风决心真切感受。但与此同时，社会上也在流行着一种观点，认为适度腐败会对经济发展起到“润滑剂”作用，而过于严明的纪律和规矩可能让人“束手束脚”，从而给经济活动带来负面影响。

不可否认，这种论调有一定市场，甚至在很多人心中深以为然。但直观感受毕竟不能代替理论分析和实践经验。毫不动摇地执行纪律，坚定不移地反对腐败，是否影响党员干部干事创业的积极性进而影响经济发展？对这一问题的正确回答，必须从科学理论中来，从具体实践中来。我们邀请政府官员、专家学者和媒体评论员共同参与，推出本期“大家说”，以期廓清认识，明辨是非。

## “反腐拖累经济”经不起检验

张新文

“抓纪律影响干部做事积极性”、“反腐拖累经济发展”，这些说法在“看似有道理”的背后，实则是旧风气下惯性思维的产物，经不起逻辑的推敲，更经不起实践的检验。抓纪律、抓作风到底会不会降低干部工作的积极性？会不会拖累企业的改革发展？从山东省国资委的实践来看，结论恰恰相反。

从从严从实激发改革热情。目前，国企改革进入深水区、攻坚期，很多改革没有先例可循，要想推动改革取得突破，必须贯彻从严从实的要求，激发干部职工推进改革的热情，严格落实责任，务实推进改革。山东省国资委按照“责任落实到人，操作分类到事，过程细化到点，进度准确到旬”的要求，将“1+5”文件细化分解为70项改革硬任务，按月进行调度分析，对存在的问题逐项进行专题研究，确保改革按计划推进。截至目前，除6项需等待中央顶层设计出台外，其余64项任务都已经完成或基本完成。现代企业制度取得重要突破，公司治理结构基本健全；11户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公司的改建组建工作扎实推进；企业经营机制进一步完善，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稳步推进，企业上市和新三板挂牌取得新进展，企业中长期激励措施更加健全。

严实相济助推企业发展。今年以来经济形势比预想的更加复杂严峻，企业保增长任务艰巨。面对这种形势，一方面必须严格落实企业保增长责任，推动企业采取更有力度的措施；另一方面要切实发挥国资监管机构的引导服务作用，出实招，办实事，求实效。我们年初明确了保增长目标，层层分解落实责任，定期调度进展情况，加大督促检查力度。大力推广宽矿集团内部市场化、华鲁恒升提质增效等经验做法，引导企业强化降本增效措施。加大亏损企业治理力度，88户企业实现扭亏为盈，9户企业关停或退出。把握融资成本相对较低的机遇，指导企业运用永续债、公司债等直接融资730亿元。实施强激励措施，对经营业绩优异、国有资本保值增值贡献突出的省管企业负责人给予特别奖励。开展经营绩效综合评价这一创新举措，选取山钢集团和山东能源两户经营形势最严峻的企业开展评价试点，对企业进行深度诊断，促进企业解决“看不见、不愿改”的深层次问题。

严明纪律强化责任担当。国资国企工作情况十分复杂，涉及法规政策众多。过去，有的同志因为怕担责、怕出事，在处理复杂敏感问题时过于考虑对自己的影响，纠缠于细枝末节问题，机械地卡条文，担当意识不强，导致有的问题久拖不决。比如省工业设备安装公司和凯远集团改制问题，分别拖了8年、10年之久，不但影响了企业改革发展进程，还大大增加了改制成本。今年以来，山东省国资委鲜明提出了“与企业一起做价值的发现者和创造者”“监管与服务并重”等理念，事不避难，勇啃“硬骨头”，解决了一

批影响企业改革发展的难点问题，坚持特事特办，组成两个工作组专门攻坚，凯远集团、工业设备安装公司改制工作画上句号。凯远集团挂牌价仅20万元，最终以5050万元成交，增值高达251.5倍。妥善解决了滨州活赛股权转让、浪潮信息股权激励等制约地方和企业久拖不决的问题，为企业改革发展创造了良好条件。

严抓实管提升思想境界。新一轮国企改革中，很重要的一点就是重新对国资监管工作进行定位，加快转变监管方式方法，加大简政放权力度，从以“管企业”为主向以“管资本”为主转变，这对国资监管机构来说是一次自我革命。山东省国资委顺应大势，拿出自我革命的勇气，主动割舍部门利益，勇于向“自己的奶酪”开刀，在全国率先实施了国有资本划转工作，将18户省管企业30%的国有资本划转至省社保基金理事会持有，积极适应从单一股东向控股股东身份的转变，与省社保基金理事会协商制定了股东会议事规则，坚持依法依规程序行使对省管企业的出资人职责。大力实施简政放权，在去年下放二十多项审批核准备案事项的基础上，今年又下放一批“高含金量”的审批事项，涉及企业改制、高管人员任免、薪酬管理等多项重要权力，大大增强了企业活力。大幅提高办事效率，将保留审批核准事项的办理时限比往年缩短一半以上，容易的当天办完，难办的尽量控制在一周之内，原本久拖不决的现象基本杜绝。主动向企业征求需要国资监管机构协调解决的问题，积极帮助企业解决实际困难，得到了企业广泛好评。

严规明纪带来清风正气。近年来，省属企业发生了一些令人痛心的腐败案件，不仅严重影响企业形象，也挫伤了广大干部职工干事创业的积极性。为此，山东省国资委牢固树立抓监督、抓纪律、抓廉政就是抓发展的理念，通过严规明纪树立正气，规范管理，促进改革发展。以公开透明为重点，建立健全国有企业监督机制，完善财务管理与审计监督制度，对省管企业按上市公司标准进行监管，建立了省管企业财务等重大信息披露制度，健全国有企业防止利益冲突机制，在国资系统率先推行了企业领导人员任职回避、公务回避和报告说明制度，建立了规范“三重一大”决策、招投标、关联交易等方面制度。制定了《企业领导人员选拔任用工作流程》等7项干部管理监督制度，从制度上防止干部“带病提拔”。创新监督检查方式，建立了省管企业巡察制度，巡回检查制度和监督检查工作联席会议制度，开展了“三重一大”决策、公款存放、招投标、关联交易等专项检查，认真落实党风廉政建设“两个责任”，加大案件查办力度，敢于“亮剑”出击。

(作者系山东省国资委主任、党委书记)



## 是亦为政

王学斌

何廉曾在其回忆录中披露，赴美留学期间，他参加过中国学生联谊会组织——成志会。它是当时规模最大、最为认真且十分活跃的中国人联谊会之一。一些后来于民国政坛举足轻重的大人物如王宠惠、王正廷、郭秉文、俞大维、蒋廷黻等都是该会会员。按照何氏的说法，“我参加这一组织别无所图，只是为了交几个朋友以及对振兴中国培养更多的兴趣，我没有参加其他会员参加的政治活动”。

观其一生，何廉确对政治兴趣不大。一次他同朋友陈翰笙去听国民党外交官任朝枢的讲话。两人反应堪称迥异：“我对他的演说倒没有什么强烈的反应，而那位政治上很活跃，甚至写些政论文章公开发表的陈先生，对这次演讲就非常关心”。不过人生际遇却偏偏喜欢弄人。归国之后，“陈先生”在政治上的进展并不顺利，反倒是何廉出任国民政府经济顾问，宦海浮沉十数年。最后他得出的感慨是：“翁文灏和我虽都在政府中位居高职，但比起‘圈内集团’来，毕竟还是外人。我们并非政府的里层人物，也非党的成员，我们不过是政府的‘装饰品’！我们从未能够搞清楚幕后究竟在搞些什么”。

对此情形，傅斯年早有预料。他始终坚持其独立人格，不为名与利同政府勾勾搭搭，卿卿我我。他同国民党始终保持一种“疏而不离，亲而不近”的距离，宛如一对朋友，虽然关系紧密，却仍保持一定距离，让双方可以理智地看待彼此间的问题。1947年，蒋介石改组政府，考虑拉胡适入阁，担任国府委员兼考试院长。时任北大校长的胡适虽然对政治仅是“不感兴趣的兴趣”，但他碍于情面，且对蒋尚抱幻想，一度颇跃跃欲试。傅得知后心急如焚，函电交驰，劝阻老师千万不要上老蒋的当。他对胡劝说，“蒋表面上要改革政治，实则缺乏起码的改革诚意。其实只是想借重先生，急欲在大堆上插朵花！只要先生您坚持不可，非任何人能够勉强。您三十年之盛名，不可废于一旦，令亲者痛，仇者快。”傅斯年这番话，最后发挥了决定性作用，胡适选择留在北大。傅氏深知，作为在野之人，或处政府外围，既可自由放炮，又能同政府处在朋友之间规劝支招的宽松状态之中，少受拘束，不用考虑各种繁文缛节，也避免了令人生厌的勾心斗角。最关键的是一旦跨入政府大门，就如同她跨过了门，一切身不由己。待“朋友”关系过渡到“夫妻”关系后，再牛气的知识分子也得听丈夫(政府)的话，惟夫命是从。稍有不便，不是失去政治主动权，就是被政府休掉，落个万劫不复。

虽然话理不糙，傅氏有关学人问政的说法终究有些过于直白。那么不妨再看看民国著名政治学家萧公权先生的观点。早在二十几岁时，萧便立志不做“官”，专求“学”。抗战期间，“从政”的机会一度来临。1943年冬，萧氏应邀到重庆出席参政会协进会，得与陈布雷见面。陈氏问萧是否愿意加入国民党。如果有，他极愿请适当的人介绍。萧答道：“北伐完成以来，许多教育界同人和我自己认定国民党是中国前途的惟一希望。因此我们于撰写时论，以非党员的身份，向政府作建设性的提议或善意的批评。这些间接拥护政府的文字虽然未必发生任何实际影响，似乎尚为一部分人所注意。假如我以党员的身份来发表同样的议论，读者未必会加以同等的重视。”

萧虽不从政，但对于国家的前途并非漠不关心。他应邀为《独立评论》撰写政论时评。萧氏“立言”的宗旨很简单，一言以蔽之：“把平日学思所得有关国家社会进步的意见提出供政府和国人的参考。所见未必是，但所知无不尽。”与此同时，萧氏还对当时社会流行的不少似是而非的时髦口号进行反思检讨，比如“读书不忘救国”说。他指出，“假如一个学生在读书的时候，一字一句之间，念念不忘救国，我相信他虽然手不释卷，却是心不在焉，不知所云。”如此一来，书既读不好，国更救不成。我们无论做任何工作，都应当对这份工作本身有真实的兴趣，把全部精神放在这工作上面。萧氏强调，学术政治间的界限必须划清。“他们同时具有两种身份，他们是国家的公民，也是学校的教师。凭着公民身份，他们可以参政，也可以入党。但这些行动既不是教师分内的职务，他们不应当借假教师的身份去便利这些行动。如果他们觉得公民的职务更为迫切或更有趣味，他们宁可放弃教师的身份，离开学校，献身政府”。从政之后，如果“倦勤”，他们也可以脱离政治，回到学校。学优则任，仕优则学，都是正当的行径。然而借教师的身份玩政治，想在学府政府中做两栖动物，却是不正当的行径。倘使一个人把学校用作政治活动的地盘，把学生当做政治资本，把学术变成政治企图的话，这样他就有意识或无意识地毁灭了学术的独立。

萧氏对自己这套“始终不会从政，但时常关心国事，并且撰写政论，贡献一偏之见，一得之愚”的作法，借用孔子的一句话来概括，即“是亦为政”。这失为知识分子对待政治的一种理智的处理态度。

## 严明纪律不能被曲解

李艳菲

很多人把经济下行的压力，归罪于纪律越来越严明，认为其挫伤了干部和商人的积极性。从表面上看这似乎有一定道理。以笔者调查的一个30多个人的欠发达县城为例，其2013年-2015年的餐饮业税收指标，以往每年的第一季度经济运行分析会上，餐饮业营业税都在400万-500万左右，但自从中央八项规定出台后，2013年第一季度的餐饮业营业税直线下降，仅为60多万元，2014年、2015年没有多少变化。一些干部就此认为，是因为纪律规定越来越多，导致了宾馆酒店门口罗雀，税收越来越少。但真实情况是餐饮业更加活跃了，只是形式变了。高档酒楼、高消费场所倒了几家，乡村农家乐、自助餐、县城僻静处的特色小吃店等却越来越多、越来越火。这些以特色服务、中低消费、便捷时尚为卖点的消费形态更适合大众消费，在节省公款的同时，老百姓普遍得到了实惠，就业机会也大大增加。

“为官不为”也并非纪律严明所致。一些官员故意把严明的纪律“神秘化”或作异化曲解的解读、执行，从而间接导致了“不作为”。国家面临重大的经济转型，利益调整格局逐步从资源与权力交换等形式，变为资源按照规则进行理性调配的形式。随着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和严格权力流程、流量管控的改革，一些靠老经验、老本本做事的方法已经行不通，而且必须创新服务理念，进行科学管理与精细化作业。在有些人看来，越来越严明的纪律就是不让干这、不让干那，认为是束缚了手脚放不开；一些依傍权力大树生长的藤蔓企业，在权力大树倒塌之后，也形同枯槁，甚至不复存在。事实上这样的经济关系是不正常的，真正的有技术含量、符合市场需求、引领未来方向的企业，恰恰能够在这种大浪淘沙的竞争中，生存下来并发展壮大。十八大后出台的一系列改革措施，其实是给权力大树清虫、除草除藤蔓，同时在权力大树外面打蜡、涂抹除草剂。这样一来，很多藤蔓企业就露出了本来面目，空壳公司、影子银行、权力会所、高档会馆等瞬间崩塌。而这一些时期恰逢我国经济步入“新常态”，经济下行的必然趋势被一些别有用心的人曲解利用，造成了因为反腐、因为严明纪律，所以导致经济下行的假象。事实上，越来越严明的纪律和规矩，只是为了让权力更加公平地配置资源，管控住本就不该生出来的第三只手、第四只手。

领导干部只有回归角色本位，才能处理好政治新常态与开展经济工作之间的关系。人的角色是多元的，每个人都同时扮演着几种不同的角色，工作身份生活身

份相混淆，是当下一些领导干部不适应政治新常态的最突出表现。杨善洲在地委干部培训会上说：“什么这长那长，你离开工作岗位还是吗？”“我回家了，我就是一个农民，我还要种地，哪来的书记？”这样的人生定位可以有效杜绝特权思想，管好八小时之外。然而，领导干部明确角色定位，严守纪律规矩，并不能自然形成。遵守纪律规矩氛围的形成，需要经过宣传、执行、规范和内化四个阶段。而这其中，规范最为关键，起着承上启下的重要作用。如一个小时候不认真吃饭，会被父母教训，浪费粮食就会被父母责骂，只有这样，吃饭的规矩才会牢记在心。因此，必须让不守规矩的干部付出代价。一方面要对不守规矩者进行惩戒和教育，另一方面要解决干部考核量化指标泛化的问题，明确守规矩的考核依据。如道德的规矩是明理、诚信、尊重，能力的规矩是会做事、做好事，勤政的规矩是按照出勤要求认真完成工作，绩效的规矩是做事要完成特定目标，廉洁的规矩是不以权谋私、不中饱私囊、依法办事等。

党的纪律、规矩要不折不扣地执行，但也不能执行过偏。如现在的乡镇对村级财务监管，要求每一笔账务都要村三委签字，对外支出的每一分钱都要直接由乡镇管理财务的人员打到供货商账户。于是就出现了一些问题。村里每次支出做什么事情，哪怕一分钱，都要把村三委找齐，共同签完字，再找相关的乡镇财务人员审核，然后逐一找供货商要发票要卡号，整个流程非常繁琐，耗时相当长。笔者调研的一个基层社区，今年七一活动期间购买了一些办公用品和会议用品，单是把这1000多元的东西买齐，发票找齐，供货者的身份证复印件和卡号找齐，就跑了十多天，村三委去乡镇开证明和打款就跑了四五趟。因此，执行纪律和规矩不能跑偏，与实际相结合严格执行纪律，才会有更好的效果。比如，纪律规定“不要铺红地毯”，有很多乡镇也写一条不铺红地毯。它从来就没铺过，现在还给它找出个事来，还想起要铺红地毯了！各地有各地的表现，什么问题突出就解决什么问题，才是正确选择。因此，领导干部都要理性辩证地看待严明纪律与执纪严明的关系，因地制宜地对待纪律和规矩的具体要求。财务是要监管，但是可以换种方式，如出物品市场价格清单，设立办公用品耗材价格的报请范围，执纪监督过程中要分清各个地方的实际问题和重点问题，针对问题出台切实可行的措施。

(作者系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廉洁研究与教育中心特聘研究员)



## 反腐才能有作为有效率

任宇波

临近岁末，党的反腐肃纪工作并未有丝毫松懈。在实现反腐地域全覆盖的同时，近來金融、教育等领域又出现了新动向。回顾三年前的这个时候，履新不到20天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改进工作作风、密切联系群众的八项规定。随后反“四风”、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的展开，使作风问题和腐败蔓延势头得到了进一步遏制。如人言，反腐“小切口”推动了作风“大变局”。

时至今日，“不敢腐”已渐成气候，但随着高压反腐成为新常态，有人开始感叹“官不聊生”，奉行“宁可不作为，也不要犯错误；宁可少干事，也不要出事”；有的为了逃避“负责任”、“受牵连”，要么对企业家避而不见，不与企业接触，要么“软拒绝”，“不吃、不拿、也不干”，不接电话、不批文件。有人形象地说，某些人那里的政商关系，从过去的“勾肩搭背”变成了“背对着背”。因为政府部门到基层、企业指导的少了，一些地方商难招了，资难引了，发展也慢了，为官不为的现象日渐抬头。以致一些企业、

群众反映，话难听，脸难看，门难进是好转了，但原来“搞点变通”还能办的事情，现在反而常常被无限期搁置，办事效率反不如从前。关于反腐导致官员不作为的担心，早已有之，甚至成为某些人敌视反腐的借口。这几年来，不断有人重提“腐败效率论”，主张反腐缓行。以所谓“腐败效率论”，来否定当前的反腐斗争，其实是把守规矩和干事创业对立起来，是对反腐作用的一种错判，或者是一种故意的混淆视听，应当予以澄清和反驳。

廉洁高效，是理想的为官之道，也是高压反腐、从严治党的目标指向。反腐是为了廉洁，更是为了高效。一般来说，廉洁的政府不大可能低效。解决了廉洁问题，必然就能解决官员激励和监督约束的问题，从而为高效行政打下法治和制度的基础。进一步讲，一个能有效控制腐败的政府，必然有健全的机制促使官员高效工作。事实证明，廉洁水平比较高的政府，营商环境也更加透明便利，其行政效率也往往较高。作为衡量营商便利程度的权威报告，最新

出炉的《2016营商环境报告》中，那些排名靠前的国家和地区，往往是世界廉洁度排名靠前的国家，比如新加坡、中国香港等。这次，中国大陆地区排名由以前的90多位，上升到第84位，应该说，这是正风肃纪、高压反腐与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相得益彰的结果。

“廉”和“勤”，可以说是一枚硬币的两面，做不到“廉”是腐败，做不到“勤”也是变相腐败。如此来看，懒政的存在，尤其是因为反腐而故意不作为，恰恰是因为反腐没有进行彻底。针对这种现象，习近平总书记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总结大会上就说过，党的干部都是人民公仆，自当在其位谋其政，既廉又勤，既干净又干事。如果组织上管得严一点，群众监督多一点就感到受不了，就要“为官不易”，那是境界不高、不负责任的表现。李克强总理也说，尸位素餐本身就是腐败，不作为的“懒政”也是腐败。为官避事生耻。“混”字当头，为官不为，尸位素餐，不但违背自身职责，而且会对经济社会发展形成阻力。治理懒政不作为，必须将反腐进行到底。

遵守规矩不是无所作为。反腐的初衷，最终是要营造健康有活力的政治生态。如果说通过反腐把一些“毒瘤”清理出党的队伍，重在“破”，那么建设高效行政的制度机制，则重在“立”。治理懒政不作为，一方面要建立、健全公务人员考核和淘汰机制，把那些为官理念不正、一心为了捞个人好处，占着官位不办事的官员，都清理出公职人员队伍。今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了《推进领导干部能上能下若干规定(试行)》，对解决干部能上不能下问题作出具体规定，针对的就是为官不正、为官不为、为官乱为等问题，必将有利于推动形成能者上、庸者下、劣者汰的用人导向和从政环境。另一方面，要进一步简政放权，健全“权力清单”与“负面清单”，明确政府职能边界和企业经营边界，尽可能释放市场活力，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落到实处。从长远看，政府与市场的边界划清了，官商交往规则理顺了，干部既廉又勤，既干净又干事，效率只是水到渠成的事。

(作者系本报评论员)